

◀ (上接4版)

推移往下垂。下午5点下班以后,林先生和我经常在研究室里一起喝酒。林先生喜欢闲聊,是个心直口快的人。现在资料卡片的整理一般用Microsoft的“FileMaker”等软件建立卡片数据库,但资料整理的原理是一样的。

第二个条件是非常彻底的资料搜集。林先生全面彻底地复制考古报告和杂志中的青铜器资料,把它们卡片化,作为研究资料。我听说过有些日本考古专业的学者嘲笑这个方法,说这是根据照片的考古学,不是真正的考古学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不在考古工地从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不是考古学。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参加考古发掘是不可能的,而且亲眼调查出土青铜器原物的机会也很有限,林先生采用这个方法实在是出于无奈。但这种嘲笑完全是没有道理的。林先生在日本参加过长崎县壹岐市原之辻遗址的发掘,参加伊朗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学术调查队进行发掘的经验也很丰富。不止如此,虽然没能在中国大陆做到,但日本国内收藏的青铜器的调查,林先生进行得非常彻底。此外,对美国,对欧洲的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典等国,对中国台湾的青铜器调查也进行得非常彻底。在欧美,只要给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研究人员写一封信,他们就接待我们,连库藏的器物也可以自由地调查,拍照也经常允许(大英博物馆不能进入仓库,我们申请的库藏器物可以在阅览室观摩)。我从林先生那儿得知了这件事,也去英国、德国、瑞典进行了青铜器和货币的调查。我们不应该忘记,林先生的商周青铜器编年是在那些实物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。

曹锦炎(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):知道林巴奈夫教授的大名,还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,当时吉林大学的古文字学科放在考古专业,因此我读到了林巴奈夫教授的《殷周时代的武器》一书,很佩服他的学问。很荣幸,后来我和林巴奈夫教授有过两次交往。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林巴奈夫教授专程来杭州,访问浙江省博物馆。他此行的目的是观摩、研究良渚玉器,由我负责接待。简单寒暄以后,我们就直奔展厅。当时著名的瑶山祭坛遗址、反山大墓尚未发掘,放在历史文物展厅中陈列的良渚玉器数量不多,但是林巴奈夫教授仍然停留了约2小时,他观察展品极其认真,对某些局部细节(包括纹饰)反复观察,一

边详细作笔记,一边时不时和我交流,可惜他的中文不太好,而我的日语也不行,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笔谈上。临走时他送我几篇抽印本文章,我记忆尤深的是,其中有一篇研究良渚玉器纹饰的,他提出这种纹饰与“云气纹”有关,也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上。另一次和林巴奈夫教授见面,是1992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“吴越地区青铜器展览”及研讨会期间,但交流不多。虽然我和林巴奈夫教授只有两面之缘,但他做学问的深入、细致,研究视野的广阔,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。

张光裕(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教授):林巴奈夫先生的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问世多年。这套皇皇巨著可以称得上是“体大思精”。《考古》1986年3期曾刊登过精彩的评介。

林先生早年对我这个晚辈的爱护和提携,一辈子难以忘怀。林巴奈夫先生跟巴纳(Noel Barnard)先生是好朋友。1971年11月,我到澳大利亚,跟随巴纳先生从事研究。巴纳先生曾在1972至1974年间安排我数度访问日本,搜集青铜器资料,并请林先生特地照顾我。当年林先生非常体谅我这位经济能力欠佳的年轻学者,在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,特地安排我住在京大附近的了莲寺;那里又便宜,又安静,往返研究所亦方便。其后,林先生又邀请我到京大人文学研究所读书会作报告,并请了名重一时的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先生替我翻译。我谈的就是与我博士论文相关的辨伪问题;当时年少气盛,不知天高地厚,讨论期间竟毫不客气地跟林先生的老师贝塚茂树先生争辩。

读书会中,我记得有永田英正先生;小南一郎先生好像也是同时期认识的。林、藤两位先生于读书会后,领着我去居酒屋站着喝酒、吃烤肉,这是我第一次领略传统日式的立食风味。在某次访问京大结束前,林先生把历次读书会的记录装订成册送给我,其中还有他亲自编辑的《金文著录目》复印本。我现在还好好保存着。至于林先生编的《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》(1966年),则是当年学习金文最有用的工具书;里面查对和记录了拓本与某器照片的出处,是他“殷周金文研究”成果的一部分,应与日后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的编辑有一定渊源。

我多次访问日本都有赖林先生引荐,才得以摩挲不少公私家收藏的青铜器;东京的藏器,则大多是松丸道雄先生带领着

目验的。没有两位先生的帮助,在我的青铜器研究路上,肯定会缺失了日本收藏这一环。

1978至1979年,我踏上了欧、美访查中国青铜器之旅,途中多次发现林先生走在我前面的足迹。回想当年在林先生的办公室和共同研究室,我有幸看过林先生把数以百计的青铜器照片,铺满在大长桌和地上的洋洋大观场面;原来那就是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成书前的倩影。

第一次以国际视野系统论述中国青铜器发现、蒐集与研究史

王世民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):日本当代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大家有三位:近年去世的樋口隆康先生,十年前去世的林巴奈夫先生,现仍健在的松丸道雄先生。本人因陪同夏鼐先生接待,有幸同他们都有过交往,而同林巴奈夫先生交往的时间最长,前后将近30年。深感荣幸的是,松丸先生专函邀我共同为林先生巨著中译本作序,遗憾的是他未能来上海参会,祝他健康长寿!

关于我与林先生交往的经过,以及对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这部书的认识,已详序言,不必在这里多说。广濂薰雄、近藤晴香、郭永秉三位先生,勇敢地承担如此繁难的中译任务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给予大力支持,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,这都需要相当大的魄力,应该向他们致敬。

为了进一步说明林巴奈夫先生著作的重要意义,我想简单地回顾殷周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史。

20世纪初期,开始用照片和珂罗版印制青铜器图录。日本方面,有帝室博物馆的古铜器图录,滨田耕作编《泉屋清赏》等书。中国方面,有罗振玉编《殷虚古器物图录》等书。这基本上仍属金石学范畴,缺乏明确的分期断代。

上世纪20年代,安阳、洛阳等地陆续有许多非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见于文物市场,又迅速大量流失海外。1928年中国开始了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,但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限,一时多未公布于世,因而青铜器的专门研究仍基本上以传世品为主。30年代,容庚参与鉴定清宫旧藏铜器,编撰几部传世品图录;梅原末治、陈梦家先后考察流失欧美的中国铜器,曾经分别编撰图录;再有瑞典高本汉(Bernhard Karlgren)等人

的研究。而标志这一时期高峰的集大成之作,是1941年出版的容庚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。该书规范了殷周铜器的定名与分类,对铜器分期也有重要贡献;书中按照器物形制编列的上千幅铜器图像,则长期发挥典型铜器参考图谱的作用。

20世纪后半期,中国的田野考古蓬勃发展,郑州、殷墟,丰镐、洛阳等地区的发掘,确立了商殷和两周考古学文化的断代标尺,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发现与研究取得显著进展,海峡两岸和西方学者编撰出版了若干精良的青铜器图录。中日两国学者致力于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分期研究。其中最具有分量的,是8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巴奈夫先生巨著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,标志着殷周青铜器研究新的高峰。这部书对截至1980年代初的青铜器资料与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。其正文部分,对青铜器研究历史的论述的详尽,对铜器形制与纹饰探讨的深入,自不待言;图版部分,三卷共有器物分型图像6600幅、形制演变等图表1600余幅、纹饰图像2800幅,总计万幅。这是最为详备的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典型图谱,仅此即为殷周铜器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极大方便。回想我们编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期间,将《综览》一书常置案头,不离须臾,对此体会尤深。林巴奈夫先生的功绩,实在巨大得无人出于其右。

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出版以后30年来,殷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。仅西周时期重点发掘的典型资料就有:山西曲沃晋国墓地、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、三门峡虢国墓地、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、陕西韩城芮国墓地,以及宝鸡石鼓山墓地等等。20年前马承源先生主编了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。近年,中国的后继学者致力于全面整理殷周青铜器资料,分门别类进行新的系统研究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,日本年轻的青铜器研究者也正在成长。但是,目前还没有新的殷周典型青铜器参考图谱问世。展望未来,可以相信,这部巨著中译本出版以后,殷周青铜器研究在已有的坚实基础上,通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,必将进一步发展,不断取得新的令人欣喜的成绩。

王辉(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):林巴奈夫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商周秦汉考古与青铜器的著名专家,其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是研究商周青铜器的皇皇巨著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。北宋真宗以后,金

石学勃然兴起,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,为其主要内容。宋人对青铜器或描绘器形,或摹写铭文,或考释文字,或据经典定器之名称、纹饰。宋人研究,虽有开创之功,但重铭文,轻器形,较为粗疏。清人崇尚“通经致用”,其青铜器研究每多创见,如对器之定名,时或纠正宋人误说。但总体上看,清人研究仍未脱宋人藩篱。近现代,随着科学考古学的引入,青铜器研究逐渐摆脱了金石学的束缚,走上了全新的道路。李济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理论,对殷墟出土青铜器分型分式。郭宝钧注意青铜器的组合、发展演化及其铸造工艺。郭沫若分商周青铜器为四期,探讨各期器物形制、铭文、纹饰的特点,又对东周青铜器分国,开地域研究之先河。容庚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对青铜器的起源、发现、类别、时代、铭文、花纹、铸造、辨伪、收藏等做了全方位的考察,是建国前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高峰。陈梦家《中国铜器概述》《西周铜器断代》也是青铜器综合研究的典范之作。此后,因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的干扰,中国大陆的青铜器研究一度相对沉寂。

《综览》第一卷出版于1984年,而其写作则在此前十余年间。在此期间,林先生长期关注安阳殷墟、洛阳、三门峡、长沙马王堆、陕西岐山、扶风等地的考古新发现,并据以讨论商周青铜器的年代及其铭文。《综览》收青铜容器、乐器4600余件,图版清晰,说明仔细,远超容氏《通论》收器991件的规模,是当时资料最为丰富的商周青铜器研究专著。此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《青铜器各类各型之形制的时代演变》对马衡、容庚、郭沫若、陈梦家、高本汉、凯恩、唐兰、水野清一、白川静等中外学者的青铜器断代标准有所批评,认为他们过于重视铭文,而轻视器形。林先生以表格的形式列举各类有代表性的青铜器,为之分型分式,以确定其时代。作者分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鼎为17型,分析各型特点,极为深入。

此书第一编第三章《青铜器种类的命名》分青铜器为食器、酒器、盥洗器、乐器、杂器等五类,酒器又分温酒器、煮鬻器、盛酒(水、羹等)器、饮酒器、挹注器、盛尊器等六小类,比之容、陈二氏分类,更为科学、合理。作者将每种器注明自名命名、依据自名以外的确切的根据命名、缺乏命名根据但承袭传统的称呼、采用名称以外的自名,至为清楚。鼎自名为鼎或贞,贞字容氏或释鼐,说鼐是斂